

舆地广记

村名“卧龙”何其多

婴里

《牟平县志》(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年版)“风俗编·方言”中对“窝落”的解释是:窝落(wō ló ng),周围高中间低的地方。村名用此,多写作“卧龙”。

为什么明明写着“窝落”却读“wō ló ng”?既然有了“窝落”的村名,何以又写作“卧龙”?其实,这里隐含着地名方言音变和地名雅化的故事。

一

笔者近来对烟台、威海两市9000多个村镇和社区的名字进行了研究,发现两市村名为“卧龙”者不在少数,或者可以说,“卧龙”是烟台和威海两市高重名率的村名之一。

烟台市所辖各县市区至少包括如下这些“卧龙”村:蓬莱小门家镇卧龙村;莱州朱桥镇卧龙村;牟平水道镇卧龙村;栖霞桃村镇卧龙村;芝罘区黄务街道卧龙社区。

除了正宗的“卧龙”村外,还有一些含有“卧龙”的衍生村名。如:牟平龙泉镇卧龙堡村;栖霞观里镇卧龙庄村;栖霞蛇窝泊镇卧龙沟村;招远蚕庄镇卧龙杨家村;招远张星镇卧龙宋家村等。

威海市所辖各县市区直接为“卧龙”的村名至少包括:文登区张家产镇卧龙村;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初村镇卧龙村。

“卧龙”衍生村名如:文登区葛家镇上卧龙村;文登区葛家镇下卧龙村;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尚山镇杨家卧龙村等。

至于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怡园街道卧龙山居委会的“卧龙山”,有两种解释。一是依据荣成市有关史料记载,人们认为“卧龙山因山体形似卧龙而得名”;一是依据民间传说:唐王李世民东征时,其军师袁天罡、李淳风见北山形似卧龙,恐有真龙天子降世,遂建塔镇之,初名“锁龙山”,后改称“卧龙山”。无论如何,“卧龙山”似乎与源于“窝落”的“卧龙”好似没有什么关系。

二

如前文所说,众多“卧龙”村多来自原生村名“窝落”,它们属于“窝落”的村名变体。而纵观烟台和威海两市村名,原生村名“窝落”及其变体也还保留了一些。如烟台市所辖的县市区就有如下多处村名属于此类:

莱阳沐浴店镇我乐村;栖霞蛇窝泊镇窝乐村;莱州柞村镇窝洛子村。“我乐”“窝乐”当为“窝落”的同音字替代,胶东方言“乐”或读“lù ò”,故二者同把“落”改为“乐”。前者又以“我”替“窝”,声同调不同,但“我乐”二字有了“我快乐”的字面寓义,更为村民所喜闻乐见。

从溯源的角度来看,“窝落”为

“源”,“卧龙”是“流”。

“窝落”属于“原生地名”。原生地名的特点是“往往只标记着小范围的地域”“常常以山水等地理实体为命名的依据”。

众所周知,人们的聚居多沿江河、避山石、趋草木,适应和利用自然环境。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带,山脚下地势平坦,水草丰富,背风向阳,很易于成为先民聚落的地址。像两山之间较大的条形川地就是胶东半岛所特有的“芥”,较小的则是“沟”,如“某某芥”“某某沟”的村名在胶东半岛司空见惯。而四周环山的小块平地就是《牟平县志》所述的“窝落”。其实,“窝落”就是“窝儿”,用于地貌时指凹陷的地方。“落”是“窝”在口语中带出的词缀,不表意。因为是词尾轻音,所以其发音并不固定,于是有“窝luo、窝long”等异读,字随音变,就有了“窝落”“卧龙”等不同的书面形式。

三

如果只是用来记音,“窝long”完全可以写成“窝龙”“窝笼”“窝隆”等形式;也完全可以写“卧落”“卧笼”“卧隆”等形式,为什么“窝long”都不约而同地变为“卧龙”呢?这就牵涉到地名雅化的问题。

说到地名的雅化,就不得不说说地名的“正俗名”问题。所谓“正名”,就是官方颁布的标准地名,而“俗名”则是民间通行的口语说法,这有点像人名中的“官名、大名”和“小名、乳名”,也像一般词语中的书面语词和口头语词的关系。正名用于正式场合,用于书面,用于与外人的交流;俗名则用于本地人的日常口语交际之中。

地名之所以有正俗异名,大抵有两种情形。

一是先有文人雅士所起的雅名,而后在民间读音讹变成带有戏谑意味的俗名,可以说是地名的“俗化”。例如福建漳州的“仰止亭”,俗呼“鸟鼠亭”(鸟鼠,方言义为老鼠)。伴随胶东村名流传,这种谐音“俗化”的故事也时有记载。如莱州港城路街道有西郎子埠村,该村“铜人(小炉匠)”多,曾有一个久远的传说:很久很久以前,有个“南相士”到过此地,临走时留下一句话:“此地定有举人出。”但有史以来,这里压根儿也没出过一个“举人”,反倒出了一大批“铜人”。于是村民调侃:南相士说得并不错,只是把“举人”出假了,变成了“铜人”。

另一种更常见的情况是命名时用土俗语词,后来写成与之谐音的文雅字样,正是我们要说的“雅化”。这种情形在城乡的村镇、街道和胡同名称更改历史中也随处可见。如北京市的胡同名雅化就有大量的例子:驴市胡同转为礼士胡同;闷葫芦罐转为蒙福禄馆;东江米巷转为东交民巷等等。我们烟台的芝罘区也有类似的

名称转换,如“勺子胡同”是因为烟台方言“勺子”音近于“su ó zǐ”,改为“索子胡同”,以寄托多子多福的心愿;另如“豆腐巷子”改为“多福巷”;“茧场街”改为“建昌街”;“染坊街”改为“宴芳街”等,均为此类。

这种“雅化”在胶东村名更改中可谓比比皆是。请看笔者故乡莱州村名“雅化”的例子:港城路街道现有“霍旺”村,原名“河汪”,本指河滩洼地,因为莱州方言“河”读如“hú ò”,后来村民图吉利,取“迅速兴旺”之义而谐方言音改现名“霍旺”;另如,永安路街道的“果达埠”,原名“疙瘩埠”,人们觉得名称不雅,且为“病字头”,不吉利,于是先后雅化为“阔大埠”“葛大埠”,最后定格于现名“果达埠”。因为莱州方言“果”读“g ē”,且“果达”虽不是词语,但字面上也能透出“兑现发达”的吉祥之意,因为音义两全其美,于是“果达埠”最终被认可。另如芝罘区村名“石灰窑”改为“世回尧”,福山区有“茂芝场”村,原名“茅子场”,因字面义不雅而改名,都属此类。

由此可知,“卧龙”村名大多属于这种地名雅化的产物。如上文所言,胶东以其地形地貌特点而原生村名“窝落”者繁多,由此而决定了其雅化的“卧龙”村名之多。在汉语词汇里,“卧龙”比喻隐居或未露头角的杰出人才,其代表性人物诸葛亮家喻户晓,深得百姓敬仰;《晋书》以“卧龙”指代著名文学家嵇康,李白和白居易等大文豪多借“卧龙”指代贤士等。正是这种民族文化心理,导致“卧龙”村名盛行。

四

放眼看去,“卧龙”村名并非烟台和威海两市所专有,源于“窝落”的雅化村名“卧龙”在国内其他地区也不鲜见。

以省内为例,青岛市黄岛区琅琊镇有卧龙村,网查其村名来历:明末毕姓从江苏海州迁此立村,因村内石状卧龙得名。清初因地势凹洼改称窝洛子,清道光十四年《诸城县续志·疆域考》载为窝洛子。1980年因重名更名窝龙村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复用现名。

临沂市沂南县青驼镇有卧龙村。据网络资料介绍,该村于明永乐年间由孙氏自云南窝洛村迁居建村,原名北窝洛,1947年土改时因村后山岗形似卧龙石像更为现名。

泰安市新泰市小协镇有卧龙村,因村内石形似卧龙而得名。该村始建于明末,清初因地势凹陷改称窝洛子,1980年因重名更名为窝龙村,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复用卧龙村名称至今。

至于山东省以外的地区,“卧龙”村镇名也是屡见不鲜,且多存在和“窝洛”名称的相关性。

总之,这些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诸多“卧龙”村,大多是“窝洛”雅化的结果。

怀故人

四姑

张玲玲

今年重阳节是亲爱的四姑七七忌日,恍惚间她离开我已经49天了。我步行到鲜花店,精心挑了二十几枝淡雅的黄白菊花,配着几枝朴实无华的康乃馨。店主仔细帮我扎成花束,当黑色的包装纸裹住花瓣时,眼泪突然在我眼里翻涌。

四姑是师范学校毕业的,当过老师,婚后还做过妇女主任,培育出四个优秀的儿女。困难年代,她教书挣的是粮食,自己省吃俭用,却把大部分粮食送回了奶奶家,帮着拉扯几个年幼的弟弟。奶奶有八个儿女,四姑虽排行第四,却早早扛起了养家的责任,成了奶奶最坚实的后盾。爷爷去世时,父亲才两岁,那些年的苦,全靠四姑和奶奶咬牙扛过来。

五伯读师范、父亲刚参加工作时,四姑以微薄的收入既要贴补家用,又要给五伯交学费。奶奶常说,你父亲刚工作时没有被子,你四姑连夜把自己的棉被打包寄了过去。后来,四伯参加工作去哈尔滨打拼,闯出了一片天,开始接济家里,日子渐渐好转。四姑脸上才终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,说自己总算能松口气了。

当年姑父南下,四姑不得不辞掉心爱的教师工作,这成了她多年来不愿触碰的遗憾。而我,作为家族二十四个晚辈里最小的一个,是四姑最疼爱的孩子。她总说我眉眼像极了年轻时的她,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,我报考了师范学院,接下了她未竟的讲台梦。从工作到家庭,从生活到成长,她始终是那个最牵挂我的人,也是我人生路上最重要的领路人。

以前每年四姑生日,我都会赶去祝福,说过很多心愿,唯有一句亘古不变:希望年年有四姑,天天能见到四姑。那时明知是奢望,却总忍不住说出口。曾经,上班时远远望见四姑从胡同里走出来活动筋骨,心里就格外踏实;下班时看到她坐在过道里和老人们聊天,满身的疲惫都能被暖意化解。

再次走进四姑住过的老屋,院子里早已长满荒草,恍惚间却又看见年少时的场景:每年正月,我们几个孩子都抢着来四姑家,步行几十里山路也不觉得远、不觉得累。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这个小院藏着最平淡的美好,四姑的手曾一遍遍安抚我们幼小的心灵,她递来的压岁钱带着体温,足以温暖一整个寒冬。

再也见不到四姑了,眼泪不知何时滑落在脸颊。汽车行驶在乡村公路上,透过车窗,我远远望见了四姑安息的那片果园。树上挂满红彤彤的苹果,是丰收的模样,这里曾留下她的足迹,洒过她的汗水。想到这些,喉咙一阵发紧,四姑的音容笑貌清晰得仿佛又在眼前……